

河北城乡统筹“围剿”散煤

3年内将压减替代散煤2700万吨,可削减二氧化硫20.06万吨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潘井泉 张铭贤

“不用老惦记着添煤和清灰了,用上天然气,干净又便捷,儿子媳妇下班后,15分钟就能做熟饭了。”记者近日在石家庄市高新区南都马村采访时,年逾七旬的张彦中大妈对村里的煤改气工程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南都马村只是河北省加快散煤污染治理的一个缩影。记者从河北省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今年起,河北省启动了为期3年的散煤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3年内,河北将压减替代散煤2700万吨,其中今年年内将压减散煤200万吨,洁净燃料替代散煤1500万吨;2017年和2018年再分别压减替代500万吨。经过3年的散煤污染治理,力争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排放量分别削减20.06万吨、2.27万吨和13.49万吨。

“比起以往使用的散煤,这种洁净型煤用量少,使得家里人净、屋净、空气净,由于有政府的补贴,总体来算与散煤价钱差不多。”

“农村地区散煤使用点多、面广,洁净型煤替代是河北农村地区消除散煤污染的一个重要途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蒋卫宁介绍说,在农村地区减少散煤污染,河北将从燃料和炉具两方面加强管控。在燃料上,一是大力推广包括洁净型煤、无烟煤、兰炭和生物质成型燃料在内的清洁燃料;二是加强煤质监管,消除劣质煤。在炉具上,河北将重点推广高效清洁燃烧炉

具,实现少烧煤和减少污染,今后3年内,河北将推广高效清洁燃烧炉具260万台。

3年内,河北将逐步完成全省农村散煤替代和清洁利用工作。其中,今年年内,保定、廊坊、沧州、唐山4市完成农村散煤替代和清洁利用;2017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4市及定州、辛集市完成农村散煤替代和清洁利用;2018年,全省基本完成农村散煤替代和清洁利用。

此外,河北还将对农业生产单位进行清洁燃烧改造,今年完成总量的30%,明年完成60%,到2018年全部完成。

供给侧治理保障煤质达标

与成千上万的散煤用户相比,散煤供给主体相对则少多了,监管起来也更容易些。在净化市场的同时,河北还将增强清洁能源的供应能力。”蒋卫宁介绍说。

河北还将加大洁净型煤推广,今年将新增建设项目50个,保供能力力争达到3000万吨。在设区市主城区和县城建成区居民生活采暖方面,今年,河北省将采取型煤与炉具捆绑销售模式,推广型煤专用炉具40万台。在农村地区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新民居取暖方面,配合燃煤锅炉改造工程,因地制宜地推广使用型煤锅炉和兰炭锅炉。

与此同时,河北还将积极拓展优质煤源,争取国家增加燃气分配量,研究制订供热采暖用气的气价补贴政策,加大煤改电支持力度,以加快散煤退出步伐。

城市区域逐步实现无煤化

“高新区现有城中村16个,为彻底解决村民做饭、采暖产生的散煤污染,2014年起,高新区在石家庄市率先启动了城中村煤改气工程。两年来,我们先后投入了7000余万元,对7个村子8000多个农户进行了天然气改造,每年可减少燃煤消耗40935吨,可分别减少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394吨、947吨和102吨。”石家庄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金珂锐介绍说,今年我们将对剩余的9个村以及未完全改造完的3个村,继续推进煤改气工程,争取年底全区实现无煤化。

石家庄市高新区散煤替代可以说走在了河北省前列。“在消除散煤污染上,河北对城乡提出了不同的目标。其中城市区域重点推进集中供热和清洁能源利用,目标是基本实现散煤归零。”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介绍说,城市区域无煤化这个目标也将分步实现,今年年内,

各设区市建成区集中供热难以覆盖的区域,居民采暖基本实现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煤;2017年,各设区市主城区和定州、辛集市建成区集中供热难以覆盖的区域,90%以上居民采暖实现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其他实现洁净燃料替代,基本实现城市无煤化。

“推进无煤化,希望能够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金珂锐介绍说,建议参照“煤改电”政策对“煤改气”进行补贴。经测算,天然气供暖费用是散煤的3倍,为减轻农户负担,他建议政府在取暖期气价上给予适当补贴,以巩固替代成果,防止反弹。

据了解,为逐步实现城市区域的无煤化,河北将优先发展集中供热,到2017年,河北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建成区集中供热率力争达到80%以上,县级市和县城建成区集中供热率力争达到65%左右。

农村地区力促能源清洁化

在曲周县麻庄村洁净型煤销售点,记者看到,一台清洁燃烧炉具里

面放上几块洁净型煤,燃烧时间长达几个小时。村支书张学海对记者说:

重庆9个项目因控尘不力被通报

4月28日前要将处理和整改情况书面回复督查组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重庆市政府主城蓝天行动督查组近日通报了4月主城区扬尘污染源巡查情况。

督查组在主城区巡查发现,内环大渡口立交和迎宾立交绿化景观工程、江北区观音桥御龙天峰四期土石方工地、沙坪坝区重庆第一中学校虎溪大学城校区土石方工地、南岸区弹子石码头河沙堆场、北碚区蔡家沥青搅拌站、渝北区双凤街道双凤社会停车场、巴南区渝南大道分流道78408部队一分库建筑渣土消纳场、两江新区鸳鸯街道丹鹤社区建筑施工机具和车辆停放场9个项目

目尘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予以公开通报。

据重庆市政府主城蓝天行动督查组介绍,扬尘污染严重影响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的浓度,进而严重影响主城区空气质量。督查组强调,各级政府 and 市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所管辖范围及行业的工地、道路、码头、堆场、工业企业和建筑渣场扬尘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扬尘污染隐患并督促整改。

对本次被通报的尘污染源,重庆市政府主城蓝天行动督查组要求,由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责令有关单位立即整改,并于4月28日前将处理和整改情况书面回复督查组。

山东一季度空气质量同比向好

15市获生态补偿金3937万元

本报记者周雁凌 见习记者王文硕 济南报道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环保厅了解到,201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兑付生态补偿资金3385万元,其中,淄博、滨州、德州等15市第一季度空气质量同比改善,共获得省级补偿资金3937万元,济宁、枣庄两市由于空气质量不同程度出现同比恶化,分别缴纳省级赔偿资金456万元、96万元。

自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以来,山东省将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标准加倍,从20万元/μg/m³增至40万元/μg/m³。这意味着,当空气质量改善时,省级财政向各市发放的补偿资金将翻倍;而当空气质量恶化时,各市向省里缴纳的赔偿资金也将翻倍。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山东省细颗粒

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平均浓度分别为88μg/m³、150μg/m³、54μg/m³、45μg/m³,同比分别改善2.2%、3.8%、18.2%、8.2%;“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平均为50.9天,同比增加6.8天;重污染天数为11.8天,同比增加1.3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8.05,同比改善3.9%。

其中细颗粒物浓度最好的城市是威海市,为41μg/m³,最差的城市是枣庄市,为121μg/m³;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最好的城市是威海市,为72μg/m³,最差的城市是菏泽市,为195μg/m³;二氧化硫浓度最好的城市是威海市,为24μg/m³,最差的城市是淄博市,为85μg/m³;二氧化氮浓度最好的城市是威海市,为27μg/m³,最差的城市是淄博市,为60μg/m³。

固废循环利用产业联盟成立

推动行业向产业化、集群化、国际化发展

本报记者徐卫星 邵丽华 刘俊超 郑州报道 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境报社、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全国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嵩山环境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环保联合会名誉主席顾秀莲为大会发来贺信。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蒲长城宣布联盟成立。

全国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产业联盟本着体现国家战略目标、遵循市场规则、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三大原则,由涉及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产业链的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金融机构、专业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行业组织。

联盟旨在解决制约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加快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围绕城市固废

循环利用产业链建立有效的产、学、研、资、商、媒合作新机制,共同有效提高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推动我国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产业向产业化、集群化、国际化发展。

据介绍,联盟将搭建开放性发展合作平台,整合及协调产业及社会资源,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提升联盟成员的整体竞争力。联盟计划下一步组织联盟专家委员会加强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并延长建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产业链。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中建材等一批固废产业领军企业以及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外专家以及行业代表500余人参加了大会。

海南打好生态扶贫搬迁硬仗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军日前主持召开全省“十三五”生态扶贫移民搬迁工作专题会议。会议指出,从保持海南良好生态、对海南长远发展和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主动作为、全力推进,坚决打好生态扶贫搬迁这场硬仗。

会议指出,从海南省情来说,扶贫搬迁进行得越早,造成的生态损害越小,需要的搬迁成本和生态修复成本越低。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市县,要切实提高对开展生态扶贫搬迁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制定方案,强力推进。

会议强调,有关部门和市县要克服畏难情绪,坚决打好生态扶贫搬迁这场硬仗。要抓紧修改完善生态扶贫搬迁规划,整合相关政策,纳入“多规合一”,纳入美丽乡村建设,预留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空间,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据了解,海南省发改委在开展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目前已起草了全省扶贫搬迁规划稿。与会人员深入开展讨论,纷纷表示要从各自职责出发,对生态扶贫搬迁给予足够的政策、资金支持。要抓紧组建扶贫开发投融资平台,多渠道保障生态扶贫搬迁资金需求。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去年11月海南已启动生态扶贫搬迁工作。其中,白沙黎族自治县道根、坡告两个黎族贫困村自然村在全省首先启动。这两个黎族村落分别位于海南省鹦哥岭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南渡江源头,其生态扶贫移民搬迁,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电工厂社区近日开展了“同一个地球,我们齐呵护”主题活动,居民用两节任意型号的废旧电池即可换取绿植一盆,号召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关注环保、关注地球、关注家园。

上接一版

在全国水环境综合整治现场会刚刚结束,与会者实地体验了浙江“五水共治”带来的环境蜕变和经济发展。在浙江,“五水共治”被比喻为5个手指,而治污水是最粗的大拇指,因为百姓对污水的感官最直接、最深恶痛绝。治好了污水,百姓的大拇指才能竖起来。

“要重点抓好大气、水、土壤三大要素‘好坏两头’的环境质量改善工作,通过抓两头、带中间。”吴舜泽认为,环境治理既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久久为功,更要集中力量解决若干彰显力度和成效的攻坚战,解决“刺儿头”性质的问题,让群众享有环境质量改善的获得感。因为百姓眼中的环境质量改善可能不全是监测数据的变化,而是身边小河的变化、雾霾天气的减少。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是继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之后,中央提出的第三个最严格的制度。

陈吉宁在报告中说,“最严格”体现了从源头、全过程和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来加强环境保护的新思路。保护的治本之策是源头严防,关键所在是过程严管,根本保障是后果严惩。

在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中,环境法治制度处于基础地位。去年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对企业形成震慑作用。陈吉宁在报告中指出,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通过5年左右时间初步形成守法新常态。今年将继续开展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年活动,全面落实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坚持督政与督企并举,严打违法与规范执法并重,提高执法效能。

吴舜泽认为,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建好督政和督企两条制度链条很重要,这有利于形成绿色发展的内生机制和长效机制,是需要改革创新、加快完善的“治本”之策,在加大治理力度的同时,一定要实现源头预防和制度建设的突破。“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同时并行、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两大核心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发展强、保护弱,一拨人管发展、一拨人管保护,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错位、脱节问题严重,这种双向激励和制度安排不利于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吴舜泽认为,这需要重构,“要通过实行发展和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倒逼地方党委政府自主实现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的融合协调。督企体系,就是要综合运用环境司法、排污许可、信息公开、损害赔偿追责等制度措施,全面落实企事业单位的主体责任,将所有固定污染源纳入监管范

围,实施行业化、系统性、精细化的全过程管理。”

“十三五”期间,要进一步完善环保法律体系,严格环境执法监管,还要推进环境司法,推动建立系统完备、高效有力的环境法治体系。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离不开经济制度,通过市场和价格调节机制,促进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建立绿色财税金融制度体系,加快建立和实施污染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统一监管,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内容之一就是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在多方促进下,我国绿色金融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绿色金融产品日趋丰富,为推动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向绿色转型贡献力量。

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既要应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结构调整及资源能源消耗等外部条件的变化,也要着力解决自身容量超载、区域分异加大、百姓诉求强烈等难题,“十三五”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面临诸多挑战。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

需要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排污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在这个多元化的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监管主体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一方面要加强环境监管,确保公平、规范、有序,让环境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弥补市场在环境外部性方面的失灵;另一方面要加强和优化环境公共服务,推动绿色发展,为辖区环境质量负责。

作为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企业需要对污染治理承担直接的主体责任,推进治污减排,生产绿色产品。“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现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记录和违法排污黑名单制度,强化企业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

公众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公众监督和合理维权能够有效地制衡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现在,公众已经成为推动环境改善的重要力量,鼓励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建立绿色生活方式等,能够有效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吴舜泽表示,“十三五”期间,要以环保督察巡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离任审计、损害责任追究等方法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的环境责任,以排污许可、

环境司法、损害赔偿等措施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还要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

当前,我国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高位,而且污染物削减潜力在下降。同时,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加,一些没有纳入总量减排控制的污染物排放量依然持续上升。对环境治理的影响进一步显现。比如,VOCs对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的影响较大,全国地表水总磷超标断面比例已经逼近化学需氧量,这对治理的科学性要求越来越高。“要有效应对和推动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需要全面谋划,整体推进,聚焦中心,打牢基础,突破难点。”吴舜泽说。

陈吉宁在报告中强调,要适应发展从粗放式走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转变,环境管理也要相应做出积极调整,向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转变。他强调,环境治理不能搞大水漫灌,不搞短期行为,这样做成本高,效果也不好。

针对差异化的环境问题,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因地制宜地采取治理措施。吴舜泽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府、市场两手发力,倒逼与激励并重,实施环境良治,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确保实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环境目标要求。”